

## 高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护士

“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挺身而出的时候”

我叫高雅，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的一名护士。有9年呼吸科和4年神经科的工作经验。

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后，因为担心工作中与患者有接触，春节前我就进行了自我隔离，离开家人，单独居住。

2020年2月1日，当得知医院在组建医疗救援队，我义无反顾地报了名。可是当时去支援哪里？护理谁？要去多长时间等一概不知。

2月2日，北京康复医院对我们开展了专题培训。当日下午，我们就接到了任务和出发通知，第二天，要到北京市的定点医院去支援。

刚到定点医院，眼前的景象和印象中的隔离病房，相差甚远。这原本是一家普通医院，没有隔离病房。因为接到命令，要临时改造成定点医院，要具备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条件。所以，这家医院当时正在进行施工改造。而我们就抓紧时间进行环境整理、清洁卫生以及相关工作流程和制度的制定、书写。

2月7日，这家定点医院准备就绪，开始接收病人。我们这些医护人员也开始了正式的工作。说到医护人员抗疫，大多数人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一些画面，也许是护士在为患者静脉穿

刺或发放口服药，也许是医护在为患者实施抢救，也许是医生们在查房、会诊。可实际上，我的工作并不是这些。刚到这里不久，我们3名工龄在12年以上、平均年龄33岁的护士被分配到了防护组。领导说，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护士，无论从责任心方面还是从体能方面，都更适合这个组工作。

我们防护组的主要工作就是监督医护人员穿脱防护服，进行消毒隔离。从喷洒、擦拭、清洁、紫外线消毒，到清点填充物资、清洗衣物等，每件事都要亲力亲为。而且因为没有保洁员，我们还要做卫生清洁工作。

虽然不能直接救治病患，但我们的工作依然很重要。因为如果医护人员没有按照正确的顺序穿脱防护服，或者因为穿防护服或戴护目镜不严格，而把不该暴露的地方暴露了，就会增加感染的几率。

尤其是脱掉防护服的时候，有的医生因为防护镜起雾，或者着急去厕所，难免动作不规范，我们会提醒他们：“慢慢来，别着急，对您的严厉就是对每个人负责！”

刚开始，我们对自己的工作也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比如，我们每天的工作4班倒，每个班一上就是6个小时。比如，因为担心穿着防护服去厕



所，造成物资的浪费。我们都偷偷穿上了纸尿裤。后来，我们学会调节自己的饮水时间，尽量在上班时间去厕所，掌握规律后，我们就不再穿纸尿裤了。

现在，我们防护组对工作内容、流程都完全适应了。我们还自信地给自己取了个新名字——“大婶组”。

最近，有人提出，想在后面的时间里去参加一下病房的工作。领导也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当问到我们时，我们一致表示：组织需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记得2003年，非典肆虐的时候，白衣天使们的英雄模样就印在了我的

脑海里。那年，正逢我中考，和家人商量后我报考了一系列有关护理的专业。之后，我终于实现了心愿，成为了一名护士。这次参加新冠肺炎的救治工作，有的护士，因为怕父母担心，并没有将消息告诉父母。我也是报名之后才给爱人打了一个电话，“通知”他，我要支援一线去了。只是，多日未见的儿子，在电话那头崩溃大哭，我才感到了一些内疚。但是，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挺身而出的时候。

都说疫情开始后，医护人员都变成了坚强战士。我坚信只要听党指挥，依靠人民的力量，中国就一定能打赢这场战争。

## 魏佳岐

北京120南区分中心急救医生

## “疫情，就是医者的战场”

我是北京120南区分中心急救医生魏佳岐。2月4日晚上9点，我成功复苏一名心脏骤停患者，又将病人顺利送入医院。这时，我接到单位的通知，加入第三批新冠肺炎患者转运组。

2月6日，大雪。我已经参与新冠肺炎患者转运工作两天。在这期间，我即使下了班也要住在指定的宾馆，进行隔离生活，隔离是对我家人的保护。谁都知道眼下的工作有感染风险，可我是医生，救人是本分。

今天我所在的车组上白班，8点钟开始接手工作，穿着刷手衣（医院常用的一种工作服）在工作区等待。上午10点钟，我接到任务，要从朝阳区一个定点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社区医院接病人运送到地坛医院。我迅速套上防护服、手套、戴着口罩、护目镜，严严实实地把自己包裹起来。患者是一位60多岁的老爷子，有武汉居住史。老爷子需要吸氧，我把他的口罩拿下来，将氧气管的鼻导管放进了他的鼻子，这时我俩几乎是零距离接触，老爷子咳嗽一声，我心里一惊，好在手没抖。

下午1点多，我们回到隔离区，病人已经顺利送达。简单吃了口饭，刚

想写病历，又接到了任务。我看到任务单上写着，病人因呼吸衰竭，需要有创呼吸机。在这种情况下，我需要在防护服外再穿一层隔离服，还要戴着防护面屏。一层层的防护装备，虽然保障了我的安全，但是捂出了好几身透汗。车窗外是鹅毛大雪，我的身体却似乎在声嘶力竭地喊着“热……”患者年近70，也是男性。在1月22日，从武汉搭乘航班回京。我和护士刘硕配合，帮助病人进行了插管和连接呼吸机。

患者意识清醒，但是他插着气管插管，出现了躁动，不仅剧烈咳嗽，而且手脚乱动。在医院住院期间，曾经将插入咽喉的气管咳出。医院给了患者镇静剂，让他镇静，途中我给他推了三次镇静剂，他每次清醒，车厢里都会响起一阵阵咳嗽声。

送完这个病患，返程途中，车组申请加了一次任务，防护服都是一次性的，在这个特殊时期，十分宝贵。为了节省防护服，也为了方便我们工作，单位准备了成人尿裤。我想着既然穿着全套装备，再多运一次患者吧，于是又送了一对年轻母子到定点医院。这时天已经全黑了，我一看表，已经



将近晚上7点钟了。

出完任务的车辆需要洗消，就是要清洗、消毒。在洗消区排队时，车窗不能打开。我看到车窗外的冰雪世界，与车内的闷热形成了两重天。护士刘硕说，她头疼恶心。其实，我也感觉非常不舒服，胃里翻江倒海，车里的气压太低了。这时，我们已经5个小时没有喝水，我的舌头已经贴在了口腔里，像一条搁浅的鱼。

下午7点40分，我在洗消区下车脱

防护服和雨靴，衣服一下身，脚踩在雪地上，一阵凉风袭来，瞬间湿黏的身体就干了。用热水洗澡是每天的必修课，这也是消毒。口罩在我的脸上勒出了红印子，司机陆禹的鼻梁被勒破了皮。

晚上，爱人跟我进行了视频，她也在急救中心工作，现在我俩都得坚守岗位。我俩都放心不下一岁的女儿。然而，作为医生，我们必须坚持，因为疫情，就是我们医者的战场。